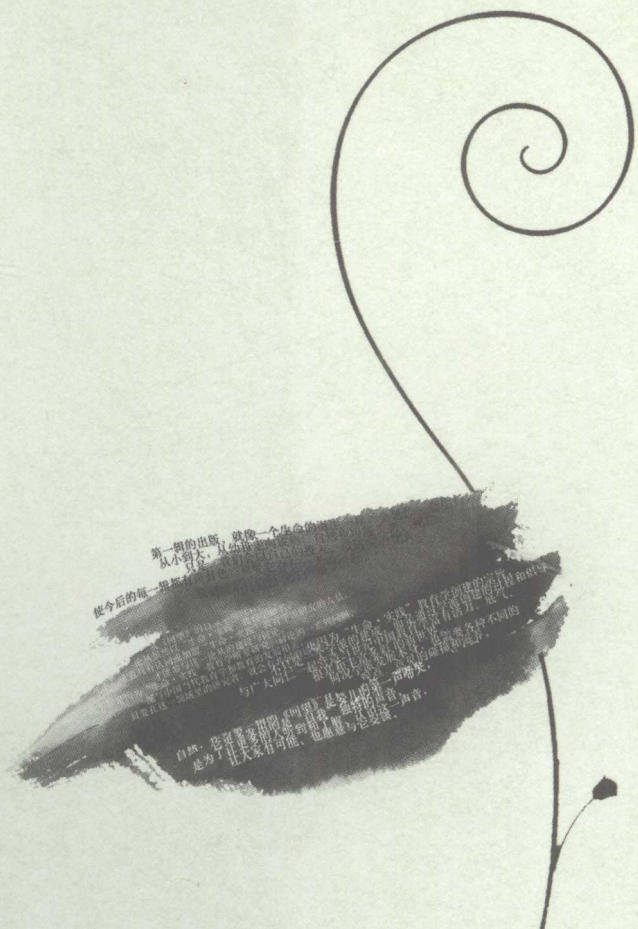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  
第一辑

# 回望

叶澜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  
第一辑

# 回望

Hui Wang

主 编：叶 澜  
副主编：杨小微 李政涛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的出版，是当代中国教育学界在构建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本书作为“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的第一辑，汇集了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在生命·实践教育观、生命·实践教育观、生命·实践教育观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于推动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结合，对于推动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 / 叶澜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 第1辑)

ISBN 978-7-5633-6668-2

I. 回… II. 叶… III. 教育学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5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0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课题研究成果。

“985工程”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创新基地研究项目——“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建研究成果。



论丛主编

叶 澜

副主编

杨小微 李政涛

编务委员会主任

李政涛

编务委员会成员

卜玉华 李家成 李伟胜 李政涛

本辑执行编务委员

李政涛

# 序 言

叶 澜

“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第一辑——《回望》问世了。它奉献给读者的是一系列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创生相关的思考、论述、体悟和问题。它期望的收获是与更多研究者相互切磋,分享经验,同时,也促进我们自己在这一研究取向和学派创建的路上继续努力、踏实地前行。因为,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一极富人文气质和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的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第一辑的出版,就像一个生命的诞生一样,会延续,会生长,从小到大,从幼稚走向成熟,自然也可能夭折、死亡。只是,我们会以自己的投入,以研究的化入,使今后的每一辑都有声有色,只要它存在一天,我们就不让它没有尊严地“活着”。

从《回望》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论丛虽然以“生命·实践”教育学命名,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认同或加盟“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研究的人员,才能参与这一论丛的建设与讨论。这不仅是因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所要研究、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中国当代教育学和教育的发展相关,只要是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者,就会有共同的话题,更因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



的宗旨,不只是一个学派的建成,更是通过学派创建的过程和倡导,与广大同人一起营造 21 世纪中国教育学富有活力、底气、根基和丰富多彩的新世界。何况学派发展本身,也需要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的碰撞和滋养。自然,作为第一辑的《回望》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它发出的更多是“自我”独特的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和了解、认识这一声音,让大家有可能也愿意与它交谈。《回望》相对集中地搜集和撰写了一批与这一学派核心概念和生成过程相关的论文,其目的正在于此。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用“冬虫夏草”的图像作为论丛的标志,而且本人新撰写的文稿,也以“从‘冬虫’到‘夏草’”为题,作为个人教育学思想认识演变过程的比喻。何以如此?这里有偶然触发的因素。我们策划、写作《回望》稿是在隆冬的季节,而第一辑的出版计划正好排在炎热的夏季。于是,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冬虫夏草”的名称。但此时,我还没有见过长在地上、活着的冬虫夏草,也不了解冬虫夏草的特性,只知道它是名贵的藏药材。于是,请学生上网搜索,寻找资料和图片。拿来一看,感到太适合表征“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成长与性情了。从阅读中得知:冬虫夏草是虫和草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这与“生命·实践”作为学派核心概念也是复合体的形态暗合。“冬虫”向“夏草”演化的过程漫长,蝙蝠蛾的幼虫在高山泥土中过冬,它因一种称为虫草“真菌丝体”的侵入而开始不断地被丝体化,直到夏天,幼虫死亡,真菌丝体从幼虫的嘴里突出棒状物,如野草露出地面,才算完成由“冬虫”向“夏草”的转化。它的奇特转化功能被清代蒲松龄的诗点明:“冬虫夏草名符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界物理信无穷。”这一以“转化”独特性获名的生物,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强调研究教育中多重转化生成机制的精神气相通。另外,冬虫夏草生长于海拔 3000 到 4000 米的高山草甸的土层中,只在中国和与中国相连的不丹、尼泊尔、缅甸四国生长。其中,在中国的生长面积最大,其他三国的虫草生长面积不但小,而且都靠近中国领土,所以冬虫夏草是典型的中国物种,这与我们追求中国原创性的教育学发展的志趣又相符。再加上图片中全貌式的活虫草形态简洁,且又不失美感,笔直向上的草之棒体犹如红烛。于是,我们选定了“冬虫夏草”作标志,还很为偶尔找到了与我们学派追求的内在气质如此相吻合的生物而满足。在此,借对“冬虫夏草”标志的简单解释表达我们的心志。

我还要代表论丛全体创办人员,向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先生,副总编辑孙杰远教授,以及所有为该论丛的出版付出心血的成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回望》是第一声“啼哭”,它自然不会优美如诗、惊天如雷。但它是真诚、无忌的,但愿这真诚、无忌的第一声“啼哭”,能打动所有挚爱中国教育和教育学事业的赤子之心。



# 目 录

中国教育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 .....	叶 澜 · 1
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	叶 澜 · 32
在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中发展中国教育学 ——新世纪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2001~2005) .....	杨小微 叶 澜 · 42
中国教育学危机 .....	吴黛舒 · 56
教育研究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知识 .....	李政涛 · 68
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实践关注 .....	杨小微 · 79
专业化时代教育学者的生存方式与研究立场 .....	孙元涛 · 89
中国学校教育的深层危机与当代新人形象的重建 .....	刘良华 · 99
追求真实的生命成长 ——对“新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体悟 .....	李家成 · 129
彻底的生命关怀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之“教师发展”意蕴浅探 ...	鲍道宏 · 141



## 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

——叶澜教授访谈录 ..... 叶 澜 李政涛 · 154

## 追寻中国教育学重建的原点：“生命·实践”

——叶澜学术思想及研究实践述要 ..... 李政涛 · 163

## 中国教育学的反省与新型教育学的生长机制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的思想路径 ..... 卜玉华 · 180

## 在实践中孕育学术生命

——由叶澜《“新基础教育”论》所想到的 ..... 王 枬 · 202

## 从“冬虫”到“夏草”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生成过程的个人式回望 ... 叶 澜 · 212

## 变革时代的生态式教育学

——论《“新基础教育”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 李政涛 · 247

## 教育学原理研究新路径之探寻

——《“新基础教育”论》述评 ..... 张向众 · 264

《“新基础教育”论》阅读札记二则：整体的与具体的 ... 李 伟 · 268

## 为了教育学的尊严

——《“新基础教育”论》读解 ..... 孙元涛 · 284

《“新基础教育”论》的个性化解读 ..... 张 永 · 288

面向幸福和欢乐的学问 ..... 庞庆举 · 294

征稿启事 ..... 297

# 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sup>①</sup>

叶澜

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 20 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学在中国经历了几度内含着中断的转向,至今终于初具了以人类的教育存在为共同研究领域的且有内在关联的教育学科群,形成了一支有活力和潜力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新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打好了一个世纪前无法比拟的基础。

然而,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新的时代和社会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不仅需要研究现实与未来,而且需要回顾与审视历史。对 20 世纪教育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是教育学能否继往开来,避免重蹈覆辙,实现新的世纪发展的重要认识性条件。综观已有的研究

<sup>①</sup> “教育学”一词,国外有单数与复数之分,国内有狭义与广义之称。单数、狭义是指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复数、广义是指教育学的学科群。本文在叙述时按上下文关系来区别,有时又以“教育学科”和“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来区别。当需要表明教育学科群中的某一门时,往往用教育学科中的某某科目来表示。本文原发表于《教育研究》2004 年第 7 期。

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一致的两方面认识:

### 1. 两个不争的事实认同

中国近代教育学科各科目的发展,其起点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连最“中国”式的学科“中国教育史”在 20 世纪的第一本著作,也是译自日本学者撰写的《支那教育史》。近代中国教育学以“引进”为发展的起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引进的直接需要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师范教育的创办和发展。教育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不争的事实。

### 2. 发展阶段的划分及每阶段基本状态的判定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发展大致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两个时期又可以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

第一阶段:1901 年至 1919 年(或 1915 年)。它从翻译、介绍日本学者编写的教育学始,到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呈第一次高潮止。上述两类教育学著作,其内容基本以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学说为依据和框架。这是直接向日本“引进”以介绍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为主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初建阶段,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与教育学科建设中断的开始。

第二阶段:1919 年至 1949 年。这是中国教育学界由向日本学习转向向欧美学习的阶段,也是中国教育学界开始形成教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和代表人物,同时出现结合中国教育实际与问题展开独立研究的阶段。教育学在向外吸取上呈现出以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思潮为主流,其他西方主要教育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多元并存的特点;在教育学体系的发展上,已呈现出各分支学科迅速形成的局面;在独立的教育研究上,宏观层面呈现出对学制设立、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特别关注和投入,学校层面主要集中在教材编制、教授法、智力测验、教育测量和心量测量等方面,其中还有不少是借助国外的教育理论、方法、量表,以中国学校教育和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研究。从上述两类独立的教育研究产生的影响来看,宏观研究远大于学校研究。这一阶段总体上可称为积聚和建设的阶段。就学科建设由向日本学转为向欧美学,并由此带



来各学科在内容体系、形态上的变化而言,这可视为引进方向的第一次整体转向。

第三阶段:1949年至1957年(或1956年)。这是教育学界批判杜威、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内“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时期。同时,又是全面引进苏联教育学科领域的教科书,其中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sup>①</sup>,并把苏联的教育理论封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时期。中国教育学科领域发生了引进方向的第二次整体转向,由学西方转向学苏联,同时使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学的发展中断了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联系,构成了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中断。

第四阶段:1957年至1966年。本阶段以1958年的“教育革命”为重要事件,开始了中国教育学科领域全面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所谓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时期,出现了教育学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的诠释的独特意识形态化的现象。1960年至1964年间,上述倾向自上而下地作了调整,以批判的方式重新介绍了一些西方教育理论。但此举尚未成气候,其微弱成效很快又被“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冲刷干净。把此阶段独立出来,主要是因为这是在意识形态强烈控制下,第一次出现的所谓“教育学中国社会主义化”的努力。这可称为教育学科由向外学转为向内树的第三次大转向,这一转向使教育学科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所剩无几,政治性却大为增强。

第五阶段:1966年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教育学领域全面遭受毁灭性破坏,这个阶段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必须全面砸烂”的时期,是一次十分严重的第三次中断时期。

第六阶段:1977年至2000年,政治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清理基地、重整队伍的基础上,教育学科进入了重建时期。在长达2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总体而言,学科建设不断加强,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学术视野日渐拓展,国际交流日益加强,而且形成了教育学科的当代体系。虽然不同科目发展不平衡,但学科建设中的反思批判意识普遍增强,中国教育学科建设因“元研究”的出现而开始进入“自为时期”,但历

---

① [苏]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有多个版本,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译本是据1948年俄文版,沈颖等译,1950、1951年由新华书店先后出版的《教育学》(上、下册)和1956年陈侠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学》。

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弊病,诸如“引进”情结、“编教材”情结、缺乏原创性研究问题等依然引人注目。总体来说,这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从恢复到繁荣和开始走向独立化的时期。

与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阶段的划分展开论述不同,本文作为又一次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总论,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以下简称“世纪问题”)。首先,这些“世纪问题”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它们的产生,伴随着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而出现并存在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制约教育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教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其次,“世纪问题”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将促进教育学研究的“观念”解放。再次,“世纪问题”的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方面的反思与批判,将会带来 21 世纪我国教育学研究的“思维”解放。这三个“解放”,就其意义而言,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这也许是百年教育学发展可能给我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学科百年史的价值追求。

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在学科发展的长河中交织在一起,互为表里,交互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这些问题凸显和清晰化,我们集中以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的三个发展性问题,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 一、政治、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

综观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百年史,首先,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教育学在百年中出现多次的“整体转向式”或“推倒(或抛弃)重来式”的“发展”,并且,几乎每一次的“推倒重来”都循着基本相同的路线:中断历史—重新启动—简单模仿(或演绎)—初级综合—建立体系。这种“发展”的结果表明教育学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发展。

产生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为基本的是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状态、文化取向和政治需要。它们在教育学发展上首先集中表现为“政

治、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这个关系又与“借鉴国外与本土研究”（简称“中外关系”）相互交织，且都以“前者压倒后者”为基本趋势。它使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缺乏活力和原创力。我们先以教育学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阶段为例，通过具体综合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 1. 强国的政治需要与教育学的引进

1901~1911年是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高潮时期，也是中国主要从日本引进教育和教育学的阶段。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典型地呈现出引进性。

作为学科，教育学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而不是内发的。外来学科在一个国家的传播，不仅仅取决于这一学科本身，同时还要受到特定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制约。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虽然直接表现在学术上，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从封闭的中国变为世界的中国，且不受列强欺侮的需要。教育学在中国被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属后发的外生型有关。

在现代化问题上，美国学者列维(M. J. Levy)第一个明确使用“后来者”(late-comers)的概念<sup>①</sup>，区分了“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界限<sup>②</sup>。关于现代化的启动问题，从它的发生源头上说，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我本土的发展或称为“内源性(indigenous)的现代化”，或者称“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一种是外力推动而发生的或称为“外源性(exogenous)的现代化”，或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中国的广义的现代化<sup>③</sup>自近代始，属后发外生型，但还有其特殊性，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大国，有自己强大的、系统的政治文化传统。1840年的中国是因军事逼迫才开始走上向外国学习的道路的，它只是为“制夷”，才去“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则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为“中体西用”，把“西学”仅限制在“用”上。此“用”一为

---

① Levy, M. J.,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6. P. 167.

② 赵一红：《后发型现代化——对发展理论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4)。

③ 指包括“近代化”和当前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概念。

强国御敌，二为固本护朝。教育的变革作为强国之方被启动，自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在维新运动中，教育又被寄予厚望，被指为“第一政事”。变革人士对国外的关注也开始集中到日本，康有为认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业，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sup>①</sup>而梁启超则以更为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同类观点，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sup>②</sup>，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sup>③</sup>。

百日维新失败，唯有学校尚存，京师大学堂成为“硕果仅剩”之物。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下令科举停武试、废八股，改书院为学堂。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和1904年颁布修订《癸卯学制》，1905年创设学堂、废科举，都可以视作维新运动教育改革宗旨和实践的延伸。新学堂的开办需要大量师资，将师范教育的创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的师范教育始于1897年盛怀宣在上海首创南洋公学师范斋。教育学类的课程是师范教育所必需的，故教育学的传入一开始就与师范教育之“用”的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1901年，《教育世界》<sup>④</sup>第9、10、11期上连载了日本立花铎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这是《教育学》以学科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此后，“以日文为版本的翻译、编译、参阅原著改写或自己根据日文版撰写教育学类教科书”之风大盛<sup>⑤</sup>，形成了中国第一次教育学界的译介高潮。

从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需要和政府的利益直接关联。这就是教育学最初的中国式“引进”都取向日本的政治原因。这一切使中国近代化在初始时期就树立了“教育强国”、“教育救国”的教育功能观，形成了强国要育新的各式人才，育新的人才要有新的学校，新的学校要有新的教师，新的教师要有师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④ 该杂志由罗振玉、王国维于1901年5月在上海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

⑤ 据侯怀银统计，1901~1905年，国内翻译日文教育学科类著述涉及10个学科，共计118本，其中教育学居首，占47本。



范学校培养,培养师资要有教育学这样一条从“强国”到“教育学”的需求转化链。面对这些需求,当时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既不能满足,也不可能短时间内通过内部改造完成,而强国的需求却迫在眉睫,于是就只能向那些打败了我们的强国学。日本离中国最近,且被国人认为也是通过外学西方、内行变法而强盛起来的国家,故被当时朝廷要臣当作第一可全面学习的国家。于是在政治与教育学的关系中,又引出了“中与外”的关系。自此以后,教育学发展中的“中”与“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由政治决定的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学术发展选择的产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学世纪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状态与意识形态具有外在的决定性意义,它构成了一个大生态,整体上始终影响着教育学的生存与发展。

## 2. 政治和教育学关系之探究与教育学独立意识的萌生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民国初期的文化政策是相对开放的。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上任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指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sup>①</sup>在他看来,不可能有脱离政治之教育,但坚决否定为专制政治所用的教育。可以说,蔡元培是民国时期第一个明确区分政治与教育,但并不割断政治与教育关系的人,也是最有力地推动学术自由的人。在教育学领域里,继“教育救国”论后,尤其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无目的,教育无外在目的”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潮,这是在认识上意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分野,寻求教育与教育学相对独立的起始。这一阶段,教育学研究上开始出现政治意识相对淡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自由主义、个性独立解放的思想在新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受欧美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群中相当盛行。但从根本和总体上来看,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教育学的发展依然存在着左右和主宰作用。到了国民党联美反共控制政权的时期,民主、自由等口号就都成了“摆设”,在教育学中,作为“国产品”的以“三民主义”为原则,

---

<sup>①</sup>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2.12)》。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